

← (上接6版)

教奉传》一书辑录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后,清廷及地方官有关准许天主教传行的谕旨和官方告示,完全是为了传教士在遇到“民教冲突”时提供合法性依据的文献汇集,后多次续增再版。

1878年后,黄伯禄常居徐家汇从事著述。这一时期,徐家汇已成为耶稣会在上海的中心,同时也是整个江南天主教的教区中心。他的中文著作大多也与教会事务相关,如《正教奉褒》《集说论真》《圣女斐乐默纳传》《函牍举隅》《训真辨妄》《契券汇式》等。从他的这些著述来看,黄伯禄是晚清江南地区天主教的一位大“护教家”。在教会史料的记载上,他也被称作是主教“秘书”,专务著述,同时负责解决教会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各种交涉。

作为“汉学家”的黄伯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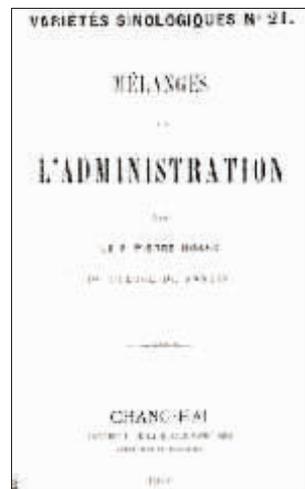
然而,黄伯禄并不是一位完全封闭于教会内的人物。笔者因课题需要,曾检索与黄伯禄有关的中外文传记资料。在多部与他有关的传略中,黄伯禄作为“汉学家”的身份逐渐浮现。我们如翻阅近代汉学史文献,也可常见黄伯禄的法文名 Pierre Hoang。1909年黄伯禄去世后,法国汉学家高第(Henri



《中西历日合璧》书影



《函牍举隅》书影



《中国官制考》书影

Cordier) 在国际汉学刊物《通报》(T'oung Pao) 上刊登了黄伯禄的讣告。高第在此讣告中列有黄伯禄法文和拉丁文著作多部。

黄伯禄的外文著作主要收录于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Henri Havret) 创办的“汉学丛书”(Variétés Sinologiques)。“汉学丛书”是近代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汉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自1892年至1938年间共出有66号。据学者统计,黄伯禄在“汉学丛书”中的著作共有8部,分别为:第十一号《中国产权研究》(又译《置产契据式》)(Notions techniques sur la propriété en Chine,1897)、第十四号《大清律摘译婚姻门律例注译》(Le mariage chinois au point de vue legal,1898)、第十五号《官盐论》(Exposé du

commerce public du sel,1898)、第二十一号《行政杂记》(Mélanges sur l'administration,1902)、第二十八号《中国地震考》(Catalogue des tremblements de terre signalés en Chine,1909,1913)、第二十九号《中西历日合璧》(Concordance des chronologies néoméniques chinois et européenne,1910)、第五十二号《中西新月对照》(Mélanges sur la chronologie chinois,1920)、第五十六号《日月蚀考》(Catalogue des éclipses de soleil et de lune,1925)。后三部皆出版于黄伯禄去世之后。可见,黄伯禄外文著作在近代来华耶稣会“汉学”研究活动中的重要。

其实,除黄伯禄外,另有5位中国耶稣会士参与了《汉学丛书》的译著活动。他们分别

是徐励(1851—1932,字伯愚)、张璜(1852—1929,字渔珊)、龚柴(1850—1914,字古愚)、王宝廉(1899—1960,字昌祉)、张正明(1905—1951,字伯达)。这6位中国天主教徒,除黄伯禄在生前不以耶稣会会士的身份示人,其余5位都是经过耶稣会培训而成的天主教神职人员。

他们参与来华耶稣会的汉学研究,主要发挥了自身熟悉中国文化、历史和制度的优势。比如黄伯禄的研究即集中于中国的产权、婚姻,以及盐业和行政制度。而徐励则主要讨论了中国文武科举制度。他们的研究为近代西人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的各项制度提供了知识来源。当时的西方汉学界对二人的研究也予以特别关注。1899年的法国汉学“儒莲奖”

(Prix Stanislas Julien) 即授予黄伯禄的《中国产权研究》和徐励的《中华武科试实则》(Pratique des examens militaires en Chine,1896,“汉学丛书”第九号)。

“儒莲奖”由隶属于法兰西科学院的金石与美文学院(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所颁发,以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7—1873)的名字命名,被誉为西方汉学界的诺贝尔奖。1875年该奖项第一次颁发,获奖者为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翻译的《中国经书》(The Chinese Classics)。黄伯禄、徐伯愚获此奖项,说明西方主流汉学界对中国耶稣会士“汉学”研究的认可。

就中国耶稣会士参与“汉学”研究的动机而言,与外籍传教士一样,传播天主教信仰是他们此类著述的出发点。黄伯禄的《中国产权研究》《大清律摘译婚姻门律例注译》都是他传教活动的副产品,以为西方传教士解决相关议题提供参考。《中国产权研究》源于黄伯禄光绪七年完成的中文著作《契券汇式》。此书原为传教士订立中国田地、房产买卖“文契”提供参考。此书乃研究晚清经济制度和“民教冲突”问题的罕见文献,现收入上海大学陶飞亚教授主编《汉语基督教珍稀文献丛刊(第一辑)》(桂林:

(下转8版) ➔

最近,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发表了著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在新书《现在启蒙:理性、科学、人文主义与人类进步》的节选。文章中,平克抨击了当今社会对理性与科学发起的“战争”,特别是人文学科对科学的攻击利用与妖魔化,他指出,要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必须依靠现代科学。

科学史完全没有成为连接科学与人文的桥梁

早在1959年,英国科学家与小说家斯诺的著名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即指出了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已经被分割成了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且两者之间已经产生了鸿沟。斯诺更多地批判了人文对科学的藐视,他质问他们:“你们能清楚地解释热力学第二定律吗?”斯诺认为,这句话其实就是“你读过

史蒂芬·平克:“请勿与科学为战”

编译/邱迪玉

莎士比亚吗”的科学语言表达。

按照平克的观察,今天,对于科学的轻视已经出现在了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和具有威望的高等学府之中。报刊杂志更多地关注于政治和艺术方面的新动态,除了议论像全球变暖这种政治话题,或者定期攻击“科学主义”,已经很少关注科学的新思想。大学文科生的课表中很少出现科学类的课程,学生几乎不怎么接触科学知识就可以从大学毕业,甚至他们学习的有些知识与科学形成了对立,有时候往往用来攻击科学。

他提到,美国大学里最常见的有关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课本是来自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这本书中的观点一直被人理解为:科学并非真理的线性累积,而是通过一系列周期性的科学革命,不断地

进行范式转换,植基于社会学的决断,而非逻辑实证主义。尽管库恩本人否认了这一虚无主义的解释,但这已成为很多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固有印象。曾有评论家说过,就如同艺术家已不再在意艺术作品是否真的“美丽”,科学家也不再介意理论是否“真实”。

科学史专家大卫·伍顿(David Wootton) 就曾说过:“在斯诺的‘两种文化’观点提出后的那么多年,科学史完全没有成为连接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反而,科学家们恐怕已经无法理解史学家所描绘的科学史了。”像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这门学科旨在使科学知识广泛地融入人文学术,然而很多时候,有些学者却走入了一个误区,并没有真正理解科学真实的本质,而是用其主观思想去影响科学的客观性。例如,2016年曾有一

篇轰动学术界的论文“冰川,性别与科学: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一个女性主义冰川学框架”,就是其中“登峰造极”之作。

科学在种族主义、大屠杀等历史中究竟有何影响

在平克看来,比起科学也被贴上呼吁性别平等的标签,更被妖魔化的要数抨击科学是征服、奴役、种族屠杀等现象发生的罪魁祸首。

他举例法兰克福学派中社会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启蒙的批判反思是他们思想理论的核心,他们认为“启蒙精神会最终走向自我毁灭”,人类并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完善,反而陷入了“野蛮状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

也指出种族大屠杀就是启蒙运动后“生物政治”的必然结果,是理性主义驾驭人类生命的行为。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也将大屠杀归结于启蒙思想,现代化,认为这是一个“重塑社会,使其成为更为科学理性的计划”。在这些观点下,纳粹的行为就被解释成了是“现代性”以及“科学性”导致的。然而,社会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所避免使用的科学方法,如定量研究和系统年代学却证明,在文明开化前的旧时代,大屠杀活动并不少见,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现象却并没有增加,反而大幅减少。

平克认为,科学在这些往往有着很长历史根基的社会行为中的作用被放大。例如,“科学种族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盛行,主张种族有优劣等级,并且试图用颅骨测量法和精神测定等“科学方法”论证北欧人

(下转8版) ➔